

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出版

村民自治

CUNMIN
ZIZHI DE
DUO SHIJIAO
YANJIU

的多视角研究

王道坤◎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出版

村民自治

的多视角研究

王道坤◎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唐一丹
封面设计:跨克创意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民自治的多视角研究 / 王道坤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614-3865-7

I. 村… II. 王… III. 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
IV. 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4809 号

书名 村民自治的多视角研究

著 者	王道坤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3865-7/D·28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6 mm×208 mm
印 张	8.7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条件及其前景(代序)	(1)
一、协商民主的理论检视	(1)
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条件	(3)
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前景	(14)

政策与理论解读

村民自治的政策分析	(21)
一、政策选择	(21)
二、政策确立	(23)
三、政策执行	(24)
四、政策评估	(27)
五、结论	(29)
村民自治——国家制度供给与社会民主实践	(31)
一、国家制度供给:引导规范和推进村民自治	(31)
二、社会民主实践:提升村民的民主和法律素质	(35)
邓小平“三农”思想解读	(37)
一、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	(37)
二、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主要特点	(44)
三、邓小平“三农”思想的指导价值	(47)

组织及机制探讨

村民委员会兼有准行政功能的依据	(53)
一、村委会兼有准行政功能的理论前提	(53)
二、村委会兼有准行政功能的法律依据	(55)
三、村委会兼有准行政功能的实践基础	(56)
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分析及其解决	(59)
一、农村“两委”矛盾,村治中的一道难题	(59)
二、一对矛盾,多种致因	(60)
三、调适“两委”矛盾,必须“多管齐下”	(65)
关于农村合村并组、取消村民组长的几点思考	(72)
一、合村并组,取消村民组长:忽视村民意愿,有悖法理 ..	(73)
二、合村并组,取消村民组长: 管理缺位,不便于群众自治	(76)
三、合村并组,取消村民组长:建制失基,负面多多	(78)

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

村民民主理财制度在实践中创新	(85)
一、回顾:中央关注村民民主理财制度	(85)
二、检视:地方各级政府创新村民民主理财制度	(90)
三、聚焦:农民群众创造性地参与民主理财制度建设	(97)
四、反思:村民民主理财制度建设中 一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101)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探索	(103)
一、村民自治的启动:适应体制转轨的新形势	(103)
二、村民自治的运作:把“四个民主”落到实处	(105)
三、村民自治的成效: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108)

四、村民自治的经验:政府扮演主动角色·····	(111)
-------------------------	-------

五、关于村民自治的几点启示 ·····	(113)
---------------------	-------

群体政治参与探究

关于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119)
-----------------------	-------

一、村民政治参与及其特殊性 ·····	(119)
---------------------	-------

二、村民政治参与研究的思路 ·····	(125)
---------------------	-------

农业劳动者群体的政治参与·····	(129)
-------------------	-------

一、农业劳动者群体及其特征 ·····	(129)
---------------------	-------

二、农业劳动者群体政治参与的形式 ·····	(134)
------------------------	-------

三、农业劳动者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 ·····	(148)
--------------------------	-------

四、农业劳动者群体政治参与的动机 ·····	(158)
------------------------	-------

五、农业劳动者群体政治参与评价 ·····	(163)
-----------------------	-------

村干部群体的政治参与·····	(169)
-----------------	-------

一、村干部群体的概念及其特征 ·····	(169)
----------------------	-------

二、村干部群体政治参与的内容 ·····	(176)
----------------------	-------

三、村干部群体政治参与的角色类型与行为特点 ·····	(195)
-----------------------------	-------

四、村干部群体政治参与评价与维护 ·····	(207)
------------------------	-------

附 录 法 律 法 规 章 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15)
----------------------	-------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	(221)
-------------------------------	-------

四川省村民委员会选举条例·····	(229)
-------------------	-------

达州市西外镇蒲家嘴村村民自治章程·····	(240)
-----------------------	-------

参考文献·····	(263)
-----------	-------

后 记·····	(266)
----------	-------

代 序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条件 及其前景^①

一、协商民主的理论检视

西方多位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协商民主予以界定。如米勒等人将协商民主理解成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决策形式。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是协商的^②。这种决策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先前的利益和观点，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在思考各方观点之后作出的判断，以及应该用来解决分歧的原则和程序。瓦拉德斯等人则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③。平等、自由地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在对话和讨论中达成共识，通过公共协商制定决策。公共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地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的过程。在科恩那里，协商民主则是一种组织形态^④。他认为，协商民主是指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这种观点将民主本身看成是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是将其看成是

①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② 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③ 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8页。

④ 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能够根据公正和平等价值来解释的协商理想。古特曼和汤普逊认为,协商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形态,即公民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的过程,各方的意见在公共论坛中互相交流,使各方的立场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①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理论出发来探讨协商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协商政治”把公民公共意志的协商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政治精英的利益协调,是公民协商与政治组织相结合的新的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模式期待达成共识的过程^②。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西方学者著述的基础上亦对协商民主作出了各自的概括。如陈家刚先生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公共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的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成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过程的实质以理性为基础,以真理为目的。公共协商结果的政治合法性不只是建立在广泛考虑所有人需求和利益基础之上,而且还建立在利用公开审视过的理性指导协商这一事实基础上。陈剩勇先生则认为,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公民是民主体制的参与主体,应该积极促进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不应仅仅局限于投票、请愿、陈情或社会运动,而应该在参与者充分掌握信息、发言机会平等与决策程序公平的条件下,对公共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进而提出可行的方案或意见。林尚立先生认为,协商政治是从民主政治的程序设计出发,“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在公共利益框架下通过有效的协调体制与协调过程,达

① 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8页。

② 朱勤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协商民主探析》,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59页。

成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① 协商民主的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由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达成共识或找到最大的共同点即共同利益，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

协商民主理论是对传统民主的一种复兴，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多元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的资源不均等而导致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克服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缺陷，弥补选举民主及其多数原则的不足”。^② 因为，根据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实行的选举民主，对于大多数缺乏金钱实力的公民来讲只有投票形式上的平等，而没有参与集体决策的公平；选举民主对于多元社会中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的道德争端，亦乏力化解。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直抒胸臆并倾听别人的意见，在这种把私利提升为公利的理性的公共协商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

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条件

近年来，有学者在研究和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时，提出了协商民主是否适用中国的问题，其实是在问协商民主在中国有无适用性条件。一种理论能否借鉴为我所用，首先要看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能否管用。这个“客观实际”，就是理论生根的

① 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第19页。

② 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载《北京日报》，2005年9月26日。

条件和环境。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确已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中国存在协商民主的适用性条件毋庸置疑。

首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引发的经济社会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为民主政治建设选择协商民主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体制条件。

现代化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空前变革。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宗教世俗化等方面的整体推进过程,也是人、社会、自然及其相互关系发生空前巨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分化,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利益关系多元化,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化,个人逐步走出传统的天地,成为行动的主体和权益主体。这是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中国属于现代化后发国家。中国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不只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政治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这是一个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叠加的进程,可以称为转型改革。这里的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而改革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两者的叠加,使我国当前的社会进程既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也具有体制转变的特征,因而情况十分复杂。社会转型、体制转变彼此渗透、借势助力、相互激荡,催生出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以及社会阶层化的奇观。从属性上讲,经济成分、物质利益属于经济生活范畴;组织形式、社会分层更多地涉及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就业方式则横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实质看,这些又都反映出经济、社会、体制变化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四个多样化”和社会阶层分化源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新的所有制格局和新的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投资企业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伴生出了农业家庭承包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多种利益主体；随着新闻出版、文艺团体、科研院所的改革，使得一大批事业单位面向市场，走向企业经营，也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再加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利益主体也就更多。与此相应，还演绎出了一大批除共青团、妇联、学联、文联、作协、科协、记协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之外的各式各样的合法登记或未登记但已存在并活动的社会组织。诸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大量的学会、联合会、研究会、联谊会等，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就业方式（“大锅饭”“铁饭碗”“统包统配”等）被打破，出现了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劳动者自主择业和自谋职业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就业方式。由于用工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企业固定工逐步减少，合同工、临时工越来越多，干部终身制和“能上不能下”的局面得到改革，干部聘任制、公开招考和竞争上岗逐步实行。许多劳动者在第一职业之外，还从事第二职业，呈现出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局面。同时，社会分层明显，仅以农民为例，就已分层为农业劳动者、乡村干部、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多个阶层。在“四个多样化”和社会分层化中，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社会经济成分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它的多样化决定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和社会分层化；而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分层化又会反作用于经济成分的多样化。根据恩格斯关于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历史力量的论断，民主政治的形态的发展必然是与一定的社会经

济制度相适应的。“四个多样化”与社会分层化为协商民主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同时又提供着体制条件。

1. 经济社会“多样化”，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新的利益阶层、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各利益主体的自主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呈现出经济社会结构多元化要求民主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的形态的发展和创新不能离开和超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不仅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物质条件，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各种利益主体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政治。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民主政治与法治不可分离，制度化的协商（法定的程序、规则）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保证。协商政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活形态的核心内容，是新世纪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此相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直接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并为提升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准准备了条件。

2. 经济社会“多样化”，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使得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分层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进一步发展；现代社会结构的多元利益分化凸显，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在不断扩大；各利益群体的碰撞在增多，矛盾多发，变数增大；公民合理合法追求利益的要求在增加，人民群众普遍要求参与国家事务及公益事业的管理……这些又要求政治体系为之具备足够的容纳能力，提供更多的化解通道。协商民主是一种有利于畅通民众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形成利益的协调与整合机制，缓冲不同利益群体要求，以达成一致与协调的

民主政治。协商民主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要求一定的社会结构与之相适应。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的社会结构状况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的特点。

3.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体制转变，为协商民主提供了体制条件。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一方面削弱了原有非竞争性民主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和体制条件（非竞争性民主以可控的和低度的社会分化为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为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民主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和体制支撑（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性民主都以社会的多元化为基础）。按照民主政治的分类，尽管竞争性民主、非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之于民主程序的价值偏好之别，但是，中国基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规定性，以及中国政治面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与既定体制，为应对社会发展和分化必须增强调控之间的张力，其在民主程序价值偏好的抉择上会更注重稳健、实效与适用。中国尽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取向上采取了逐步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非竞争性领导体制的做法，但决不会贸然地在一个可见的时期内建立高度竞争性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架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强调公民的合法性政治参与，反对有悖社会发展稳定的行为和做法。据此，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在民主程序的选择上，会用协商性政治的方法处理前进中的社会矛盾，启动利益协调机制，将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实现的协商性民主作为首选项。这样，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体制转变为协商民主提供的体制条件将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中国政治文化的“和”“合”传统，对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认可及其对多元共存和发展的接纳，既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有所契合，又为协商民主被中国借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精神资源。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内部治

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例如，《易传》高度赞扬并极力提倡“和”的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史伯在议论到周朝兴亡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了“和为贵”的主张；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古代先哲们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标准和社会治理标准，其本身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之间的差异。老子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认为阴阳二气虽然处于不停的冲撞之中，但他们始终能够在“道”的统一下和谐相处。儒家经典《中庸》还强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王阳明指出“天理亦有个中和处”。中国的“和”“合”文化还强调人与和谐就要对等和平等。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政治理念，把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作为追求的目标。康有为撰《大同书》，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关于中国的政治，严复曾用“贵一道而同风”来概括，梁漱溟则直指“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睿智地看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吸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①中国先贤们奉行的“和”“中”思想，体现在政治价值观念上是重和谐，贵合一，和为贵。“和”是政治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表征。“和谐而又不千

^① 叶小文：《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载《中国宗教》，2005年第6期，第13页。

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① 2002年李瑞环在英国发表讲演时指出：“‘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费孝通曾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一文中讲，“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和’。‘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 综上观之，中国政治文化的这种“和”“合”传统，既与现代民主政治强调的多样性、多元性、亲和性，主张兼容并蓄、共存发展、平等开放和对话交流，追求政体的清正、政治的澄明和民生的康乐等基本精神甚为契合，又为协商民主被中国借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精神资源。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和”“合”观，在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就当代中国而言，其直接的体现是“和平共

① 江泽民 2002 年 10 月 24 日在布什图书馆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 年 10 月 25 日，第 1 版。

② 叶小文：《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载《中国宗教》，2005 年第 6 期，第 12 页。

处”。“在 50 多年的中国政治实践中,‘和平共处’作为一项最基本的价值和原则,不仅被用于中国的外交,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战略,而且也用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建设和制度设计。其具体成果有两项:一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二是‘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① 不仅如此,中国政治文化,还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息事宁人”、“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有事好商量,不宜进公堂”,这些都是对这种“和”“合”思想的注解和说明。“和”“合”思想历经不断的实践累积和文脉承传,不但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积淀转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有研究表明,政治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就深深地埋藏于民族群体的灵魂深处,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尽管能够变化,但比较艰难。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政治文化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与集团的属性、民族性和宗教相联系的人们的政治态度、同一性和价值观,最终是稳定的,这种原始的内在联系似乎是不可破坏的。”^② 据此,我们或许能够解释中国农村推行村民自治近 20 年来,为何“村民都在意自己是否具有选民资格,而一些村民却不会在意自己最终是否参加选举”^③ 这一普遍现象。乡村社会作为一种自治共同体、生活和文化共同体,非常重视内部形成的规则、认可共同的权威,加之传统乡村社会的“礼治”、“邻里礼让”和“有事好商量,切勿进公堂”的政治文化心理,相当数量的农民本身对竞争性民主那套话语系统就不十分认同,再加上竞争性民主带来的后果往往不是社会和谐而是分裂和对立,这就难

① 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载《学术月刊》,2003 年第 4 期,第 21 页。

② 刘松阳、刘锋:《政治心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1 页。

③ 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载《学习与探索》,2005 年第 4 期,第 63 页。

怪他们重视选民资格这种法定权利和相应地位，而不在意自己在选举中扮演什么角色（笔者引这一个例子，并非否定法定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仅用以说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久远）。农民重视自身法定权利资格，这是了不起的一大进步。他们会更倾心于强化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青睐协商性民主，通过对村社区事务的广泛参与，共同议事决策，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也从一定角度表明，中国政治文化为协商民主提供的丰富精神资源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及其统一战线理论为协商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制度架构。

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和统一战线理论，最早见诸《共产党宣言》。在这篇光辉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必须同各民主政党、团体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①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再次指明多党派合作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极为重要的，指出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转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

列宁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